



THE THIRD WAY

The Renewal of Social Democracy

第三条道路

社会民主主义的复兴

Anthony Giddens [英] 安东尼·吉登斯/著

北京大学出版社
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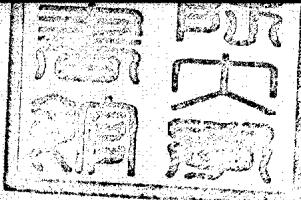
国防大学 2 070 9583 7

第三条道路

社会民主主义的复兴

Anthony Giddens [英] 安东尼·吉登斯/著
郑戈/译 黄平/校

北京大学出版社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著作权合同登记 图字: 01-1999-2676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第三条道路:社会民主主义的复兴/[英]吉登斯著;郑戈译.—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1

ISBN 7-301-04426-7

I. 第… II. ①吉… ②郑… III. ①社会制度-研究 ②社会
民主主义-研究 IV. D03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1999)第 74366 号

书 名: 第三条道路——社会民主主义的道路

著作责任者: [英]安东尼·吉登斯 著

责任编辑: 王碧莹 冯金红

标准书号: ISBN 7-301-04426-7/D·449

出版者: 北京大学出版社

地址: 北京市海淀区中关村北京大学校内 100871

电话: 出版部 62752015 发行部 62754140 编辑部 62752027

排版者: 北京大学出版社激光照排中心

印刷者: 北京大学印刷厂印刷

发行者: 北京大学出版社

850 毫米×1168 毫米 32 开本 6.625 印张 140 千字

2000 年 1 月第一版 2000 年 1 月第一次印刷

定价: 15.00 元



作者简介

安东尼·吉登斯(Anthony Giddens) 1938年出生于英国，是当代西方著名的社会学理论巨匠。曾长期在剑桥大学国王学院(KING'S COLLEGE)任社会学教授，现任伦敦经济——政治学院(LSE)院长。70年代初以来，他撰写或主编了《社会的构成》、《现代性的后果》、《民族—国家与暴力》等三十多部著作，这些著作对当代社会学以及政治学、历史学、人类学等都产生了广泛而深刻的影响，并引发了许多富有建设意义的激烈争论。吉登斯新近的一些著作，特别是《超越左与右》(Polity Press, 1994)，对全世界许多国家关于社会民主之未来的讨论产生了极大的影响。

译校者简介

郑戈 北京大学法学博士，主要译作有：《宪政与权利》、《宪政的哲学之维》、《普通法》、《公法的变迁》。

渠敬东 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博士，主要著作：《马克思主义社会思想史》、《缺席与断裂》，主要译作：《社会分工论》、《宗教生活的基本形式》、《霍克海默集》、《结构主义以来》、《过去的声音：口述史》。

黄平 伦敦经济一政治学院社会学博士，相关著述有：《安东尼·吉登斯：结构化与现代性》、《吉登斯评传》、《解读现代性》。译作包括安东尼·吉登斯著《现代性的后果》。

作 者 序

我撰写这本小书的目的,是想为目前正在许多国家展开的关于社会民主政治之未来的讨论作出一点贡献。之所以会存在这样的讨论,其原因是十分明显的:直到本世纪 70 年代末期在工业化国家仍然占据主导地位的“福利共识”的瓦解,马克思主义的信誉最终受到质疑,以及促使这一切发生的异常深刻的社会、经济和技术变迁。我们应当怎样来回应这些变化?社会民主究竟还能否作为一种独具特色的政治哲学而延存下来?这些问题的确已经变得越来越模糊。我相信,社会民主无论在意识形态层面还是在实践层面都不仅能够延存下去,而且还会兴盛起来。但是,只有在社会民主党人愿意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彻底地修正他们

第三条道路

的既有观念的情况下，社会民主才可能存在并发展下去。他们需要找到第三条道路。正像我在正文中将会指出的那样，“第三条道路”这个术语本身并不具有特别的重要意义。在社会民主的历史上，这一术语已经被使用过许多次；而且，试图申言不同的政治主张的思想家和政治家们也曾经在不同的语境中使用过它。在这里，我用这个术语来指称社会民主的复兴，即在过去一个世纪中，社会民主主义者不得不经常进行的阶段性反思主题的当下形态。

在英国，“第三条道路”已经逐渐同托尼·布莱尔和“新工党”的政治战略联系起来。人们经常把托尼·布莱尔的政治信念同美国“新民主党”的政治信念相比，而新工党与新民主党之间也的确存在着紧密和直接的联系。有人说过：“与撒切尔政府和梅杰政府一样，布莱尔政府是到大西洋的彼岸，而不是到英吉利海峡的彼岸去寻找启发。它的政治修辞是美国式的，影响其政治方略的知识资源来自美国，甚至连它的政治风格都是美国式的。”^①

这种说法并不完全正确。比如，工党的劳动福利规划从表面上看似乎是带有美式标签，但是，经过仔细推敲，我们便会发现，其实它的灵感更直接地来自于斯堪的纳维亚半岛诸国——而不是来自于美国——积极的劳动力市场规划。在这一观点的有效部分中，其重点也需要加以修正。关于新工党的讨论尽管是活跃而有趣的，但这种讨论基本上是在忽视欧洲大陆已经进行了一段时间的关于社会民主的类似讨论的情况下进行的。托尼·布莱尔与老工党的决

^① David Marquand: "The Blair Paradox", *Prospect*, May 1998, p. 20.

作者序

裂是一项意义深远的事件，但是，几乎所有的欧洲社会民主党也都完成了类似的决裂。

在英国进行的类似讨论中，有许多方面尚有待于赶上欧洲大陆关于社会民主的讨论。然而，英国又正在为一种蓬勃兴起的新观念作出积极的贡献。与其简单地照搬美国的思潮和观念，英国不如成为一座在美国与欧洲大陆之间的沟通之桥。大多数欧洲大陆国家都未曾像英国那样有过如此长时期的新自由主义政府执政。不论撒切尔主义在英国造成了别的什么影响，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它震动了英国社会。玛格丽特·撒切尔正像大多数新自由主义者一样，并非一个一般意义上的保守派。在自由市场的旗帜下，她攻击既存的组织与精英；与此同时，她的政策更进一步推进了已经遍及整个社会的变迁。工党及其理论立场的同情者对此作出的最初反应是重申老左派的观点。但是，正是由于这样做而在选举上遭受的挫折，又促使它转变自己的取向。因此，与欧洲大陆的社会民主阵营中产生的观点相比，在英国开展的政治讨论中产生了一些更加自由和开放的思路。在英国产生的思想与欧洲大陆的讨论是可以有直接的相关性的，而它们却是针对不同的背景而展开的。

这本书源于我与伊安·哈格里夫(Ian Hargreaves)和杰夫·马尔干(Geoff Mulgan)所进行的非正式的晚间讨论，我想对他们两人表示感谢。起初，我们想合编一部关于社会民主主义复兴的文献集。由于各种原因，这一计划未能实现，但是我从我们之间的讨论中得到了许多启发。我必须特别感谢戴维·赫尔德(David Held)，他细心地阅读了本书的初稿和好几份修改稿，他的评论对于最后形成的文本是

关键性的。其他对我帮助甚大的人士还包括：马丁·阿尔布罗(Martin Albrow)、尤里奇·贝克(Ulrich Beck)、艾里森·齐弗斯(Alison Cheevers)、密里安·克拉克(Miriam Clarke)、阿曼达·古德尔(Amanda Goodall)、斐欧纳·格拉姆(Fiona Graham)、约翰·格雷(John Gray)、史蒂夫·希尔(Steve Hill)、朱利安·勒·格兰德(Julian Le Grand)、戴维·米利班(David Miliband)、亨利塔·摩尔(Henrietta Moore)和安妮·波尔(Anne Power)。我还想对阿丽娜·勒德内瓦(Alena Ledeneva)表示衷心的感谢，她不仅对全书的问世贡献良多，而且，每当我感到沮丧——这是常有的事情——的时候，她总是鼓励我坚持下去。

目 录

作者序	(1)
第一章 社会主义之后	(1)
社会主义的衰落	(3)
老派社会民主主义	(9)
新自由主义的观点	(12)
最近的争论	(18)
政治支持的结构	(21)
社会民主主义的命运	(25)
第二章 五种两难困境	(29)
全球化	(30)
个人主义	(36)
左和右	(40)
政治的行动主体	(49)
生态问题	(57)
“第三条道路”政治	(67)
第三章 国家与公民社会	(73)
民主制度的民主化	(74)
公民社会问题	(82)
犯罪与社区	(89)
民主的家庭	(92)

第三条道路

第四章 社会投资型国家	(103)
平等的含义	(105)
包容性与排斥性	(108)
积极的福利社会	(115)
社会投资战略	(122)
第五章 迈向全球化的时代	(133)
世界性国家	(134)
文化多元主义	(137)
世界性民主	(143)
欧洲联盟	(148)
全球统理结构	(151)
全球范围的市场原教旨主义	(155)
结语	(161)
附录：吉登斯访谈录：现代性与“第三条道路”	(165)
中英文译名对照及索引	(197)

第一章 社会主义之后

- ▶ 社会主义的衰落
- ▶ 老派社会民主主义
- ▶ 新自由主义的观点
- ▶ 最近的争论
- ▶ 政治支持的结构
- ▶ 社会民主主义的命运

1998年2月，托尼·布莱尔在华盛顿与美国领导人举行了一次政策性讨论，讨论之后，布莱尔表述了为21世纪的国际社会而达成一种中间偏左的共识的雄心壮志。这种新的努力将发展成一种回应全球秩序变迁的政策框架。他说：“老左派抵制这一变迁，新右派则任其发展。而我们应该驾驭这一变迁，使其达致社会的团结与繁荣。”^①这项任务是非常艰巨的，因为正像布莱尔这几句话所表明的那样，既存的政治意识形态都已不能对此变迁作出它们的反应。

^① Tony Blair, "Interview", *Guardian*, Feb. 7, 1998.

150 年以前，马克思写道：“一个幽灵在欧洲游荡”，这就是社会主义或者共产主义的幽灵。^①这一点在今天看来仍然是正确的，但我们说它“正确”的理由却不同于马克思的设想。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已经消逝了，但它们的幽灵仍然缠绕着我们。我们不能简单地放弃推动他们前进的那些价值和理想，因为这些价值和理想中有一些是为我们的社会和经济发展所要创造的美好生活必不可少的。目前我们所面临的挑战，就是如何在社会主义经济规划已经失信的地方使这些价值再现其意义。

今天的政治思想似乎已经失去了它们的鼓动力，而政治领袖们似乎也已经失去了领导的能力。公共讨论的主题成了各种各样的担忧：道德水准下降、贫富悬殊加剧、福利国家的压力，等等。惟一表现出坚定的乐观主义心态的群体就是那些相信技术可以解决我们所面临的一切问题的人们。但是，技术变迁的后果从来都是好坏参半的，而且，技术在任何情况下都无法为一种有效的政治规划打下坚实基础。如果政治思想想要重新获得感召力，它们就必须走出单纯对现实政治作出反应的模式，而且不能把眼光仅仅局限于人们习以为常的事务和狭小的空间范围之内。如果没有理想的话，政治生活就一无是处；但是，如果理想与现实可能性无关，它们就是空洞的。我们既需要知道自己想要创造的社会是什么样子，也需要知道向这种社会迈进的具

^① 这里是指马克思、恩格斯的《共产党宣言》中的开篇第一句：“一个幽灵，共产主义的幽灵，在欧洲游荡。”请参见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翻译的《共产党宣言》中译本（人民出版社 1992 年第二版）。——中译者

体方式。本书试图指出如何达到这些目标以及如何使政治理想主义再生。

虽然本书的许多论证都涉及到广阔的范围,我的主要参照对象仍将是英国。在英国以及在时下的许多国家,理论都落后于实践。由于失去了原有的确定性,号称代表左翼的政府正在创造的政策是不堪一击的。理论之体必须有政策骨架的支撑,不仅仅是从理论上认可其所作所为,而且要提出具有更明确的方向感和目的感的政治框架。因为左翼确实总是与社会主义联系在一起的,而现在社会主义——至少,作为一种经济管理体制的社会主义——已经淡出了历史舞台。

社会主义的衰落

社会主义的起源与18世纪中晚期发生的早期工业社会的发展息息相关。它的主要对手——保守主义也产生于这一时期,后者是在反对法国革命及其后果的过程中逐渐成型的。社会主义一开始是作为一种与个人主义相对立的思想体系而出现的,只是在后来它才把重点放到对资本主义的批判上。在共产主义随着苏联的兴起而获得特定的含义之前,它在很大程度上是与社会主义一词彼此重合的,两者都试图维护社会或共同体的首要地位。

社会主义首先是一种哲学和伦理学上的冲动。但是,早在马克思之前,它就已经披上了经济学说的外衣。然而,正是马克思为社会主义提供了一种严密、精细的经济理论。

他还把社会主义放到一种对历史加以全面审视的背景中去。马克思的基本立场逐渐为其他所有的社会主义者接受，不论他们在其他方面存在多大的分歧。社会主义试图直面资本主义的局限性，以便使资本主义具有人性，或者完全推翻它。社会主义经济理论的基本思想是：如果让资本主义任其发展下去的话，它在经济上是缺乏效率的、在社会上是严重分裂的，而且，从长远来看，资本主义无法实现自身的再生产。

资本主义可以通过社会主义性质的经济管理而被人性化，这一观念使社会主义具备了一个极为坚硬的外壳——尽管对于如何实现这一目标还存在各种不同的观点。在马克思看来，社会主义的兴衰取决于它能否创造出这样一个社会的能力：与资本主义社会相比，这个社会能够生产出更多的物质财富，并且能够以更加公平的方式来分配这些财富。如果说社会主义现在衰落了，则正是由于这些主张落空了。社会主义曾经以非凡的方式创造过奇迹。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的 25 年间，社会主义的计划经济似乎普遍存在于东方和西方。正像著名的经济问题观察家 E. 德班在 1949 年所描述的那样：“我们现在全都是计划者……自从大战以来，对自由经济的普遍信仰，已经以令人惊异的速度在世界各地迅速瓦解了。”^①

西方社会主义的主要形态是社会民主主义，一种温和的、议会制的社会主义，其基础是得到强化的福利国家。在

^① E. F. M. Durban: *Problems of Economic Planning*. London: Routledge, 1949, p. 41.

包括英国在内的许多国家,左翼和右翼都同样为福利国家的创立作出了贡献。但是在战后一段时期,社会主义者宣称这些贡献是由他们独家作出的。至少在某一段时期,即使是在苏联那样的社会中,无所不包的计划也呈现出经济上的有效性,虽然在政治上苏联从来都是专制型的。在 60 年代,连续几届美国政府都对“苏联将在未来 30 年内从经济上赶超美国”这样一种宣称严阵以待。

事后来看,我们终于明白了苏联为什么不仅未能赶超美国,反而远远落在了后面,以及为什么社会民主自身也遇到了危机。社会主义的计划经济理论从来都是很不完备的,这些理论低估了资本主义在创新、适应以及不断提高生产力方面的能力。社会主义也未能把握市场作为一种向买卖双方提供基本信息的机制的重要意义。当然,只是 70 年代初以后,在全球化和技术变迁的步伐逐渐加快的过程中,这些缺陷才逐渐暴露出来。

从 70 年代中期到苏联解体这一段时间,社会民主制度越来越多地受到自由市场哲学的挑战,特别是受到撒切尔主义或里根主义(更一般的称谓是新自由主义)的挑战。在此之前的一段时期,主张市场自由化的思想似乎已属于过去,属于一个已经被超越的时代。自由市场的重要鼓吹者弗里德利希·冯·哈耶克以及其他站在自由市场的立场上批评社会主义的思想家们的言论,曾经一度被视为古怪偏执,但它们 70 年代中期以来一下子又成了一股不容忽视的力量。新自由主义在欧洲大陆的大多数国家造成的后果比在英国、美国、澳大利亚和拉丁美洲要小。但是,正像别的地方一样,自由市场哲学对欧洲大陆的影响也是很强的。

第三条道路

“社会民主主义”和“新自由主义”概念所覆盖的范围非常之宽泛，涉及到具有各种不同政策取向和言说方式的群体、运动和党派。例如，虽然里根和撒切尔之间是相互影响的，但他们在某些情况下仍然奉行着不同的政策。撒切尔夫人刚刚上台时，并没有一套羽翼丰满的意识形态，这种意识形态是在她执政的过程中逐渐发展成型的。“左翼”政党（比如新西兰的政党）在效法撒切尔政策的时候又为其中一些关键的政策信念赋予了不同的含义。而且，新自由主义也有两个流派。主要的一个流派是保守派，“新右派”这一术语就源于这一流派。新自由主义变成世界各地许多保守党派的政治观点。但是，还有另外一种与自由市场哲学相联系的重要思想类型，那就是道德和经济问题上的“自由放任论者”（libertarian）。比如，与撒切尔式的保守派不同，自由论者赞成性自由或者主张毒品的合法化。

“社会民主主义”则是一个更加宽泛和更加含糊不清的术语。我用它来表示属于持改革立场的左派阵营的政党和团体。在二战结束后不久的一段时期，许多不同国家的社会民主主义者都持有一种大体上相似的观点。这就是我将会论及的老派或古典的社会民主思想。自 80 年代以来，在回应新自由主义的兴起和社会主义所面临的问题的过程中，世界各地的社会民主主义者都开始放弃这种先前的立场。

实践中的社会民主与由它们孕育出的福利制度一样有着各种差异很大的形态。欧洲的福利国家可以分成四种不同的制度类型，它们都分享着共同的历史起源、目标和结构：